

# 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方法審視 與境界提升\*

王建偉

---

[提 要] 由於近代北京城市身份的特殊性與變動性,近代北京史容易“隱身”於中國近代史或民國史之中,導致基本面目不夠清晰,定位不夠準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作為一門學科的體系構建。本文重點不在全面羅列與評述近代北京史的最新成果,而是通過檢視研究現狀,歸納主要特徵,查找其中存在的諸多制約瓶頸。同時,參照一般城市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審視近代北京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探討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國家視野與地方視野如何有效兼顧、宏觀與微觀如何有效互動、多學科方法如何綜合應用等問題,以期為近代北京史研究不斷走向深化搭建學術階梯。

[關鍵詞] 近代北京 城市史 國家視野 空間維度

[中圖分類號] K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4-0179-11

---

城市史是當前史學研究中最具現實意義、最具學術活力、成長最快的分支學科之一。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國內的城市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成果可謂遍地開花。借助這股學術潮流,學界對近代北京的關注越來越多。許多科研機構都有開展相關研究的項目與計劃,與之有關的學術會議、小型工作坊數量增多,青年面孔不斷湧現,許多高校的研究生紛紛以近代北京為題撰寫博士、碩士學位論文。與此同時,檔案、文獻、報刊的數據化發展迅速,不同學科方法被引入,國內外的高水平學術成果持續面世。如果以國內最具代表性的上海史為標杆的話,當前的近代北京史研究雖然在規模上暫時還無法與其分庭抗禮,但由於承載內容的複雜與牽涉層面的寬廣,展示出了更大的潛力與可能性。

在這種背景之下,系統梳理近代北京史研究的學術史脈絡,客觀評估研究現狀,分析存在的問題與不足,預見未來的主要發展趨勢,從而在日益激烈的學術競爭中拿出真正匹配北京城市地位的、讓人信服的優秀成果,應該是以近代北京史作為志業的研究者面臨的緊迫任務。本文主要梳理

---

\* 本文係 2017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近代北京城市空間結構演變研究(1900~1949)”(項目號:17BZS096)的階段性成果。

21 世紀以來相關領域的代表性成果，重點反思其中涉及的方法論以及未來可能的走向。<sup>①</sup>

## 一、近代北京史研究的追趕之勢

對於近代北京史的時間斷限，本文將其界定為 20 世紀上半期，即以 1900 年的庚子事變為起點，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在這段歷史期間，北京從一個延續數百年的國都，逐漸轉型為近代意義上的城市，城市形態與功能發生重大變化，地方行政體系以及管理體制更新，城市空間重塑，人口增長，社會結構經歷新的分化與組合，新型社會組織建立，現代工商業初興，成為北京城市發展進程中的重要過渡階段。

談及近代北京史研究現狀，有必要引入一個參照維度：上海。作為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兩座城市，北京與上海擁有獨特的氣質性格與文化特徵，各自的城市史研究也呈現出鮮明的學術理路與論述方式。對於中國城市史研究而言，上海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相關的上海史研究在規模以及水準方面都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這座東方“魔都”以其特殊的魅力，持續地吸引著眾多學人。國內外一系列出色成果的出現使上海史超越了作為地方史的範疇而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領域。<sup>②</sup>另一方面，上海史研究的繁榮也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周邊區域史研究的興起，逐漸催生了以上海為中心的江南市鎮史的成熟。

近代北京史研究則起步較晚，並在一段時期內比較沉寂。1986 年，國家社科基金“七五”規劃重點項目選取上海、天津、重慶、武漢率先啟動近代城市史研究計劃，北京並未踏入這列車道，直接導致其在起跑階段就處於不利位置，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來的進展。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在 1994 年推出十卷本《北京通史》（中國書店出版社），民國卷只佔一本。2008 年，五卷本《北京城市發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近代卷同樣只有一本。至今，尚未見到學界廣泛認可的獨立以“近代北京”或“民國北京”命名的城市通史著作，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相對而言，近代北京的專題研究成果比較豐碩，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文學、藝術、教育、媒體）、社會（人口、婚姻、家庭、醫療、日常生活、救濟、風俗）、空間（街區、道路、胡同、廣場、寺廟、電影院、公園、戲園、茶館、妓院）、群體（學人、工人、藝人、警察、律師、僑民、學生、報人、商人）等多個方面。<sup>③</sup>

受西方“新文化史”思潮的影響，借助各種數據庫資源，一些學人力圖穿透普遍關注的表象，細緻挖掘更加隱蔽的歷史場景。當前的研究不再局限於以男性、上層為主導的精英階層，一些以往不太被關注的所謂“底層領域”也躍入研究者視野，以往不易被呈現的群體（妓女、婢女、水夫、糞夫、罪犯）也浮出水面。這些人群雖然地位不高，但與城市的樣態、面貌及日常生活關係密切。此前一些被認為是邊緣的史料被應用，如一些小說、畫報、知名度不大的地方報紙等，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城市所能呈現出來的豐富面相。

一些通常所謂的局部“小問題”，經過視角轉換與材料累積，也展示出超越其單體事件之外的大視野”。以近代北京銅器作坊的生產和銷售為例，背後牽涉蒙藏商貿、藏傳佛教信仰以及安定門外關廂地區商業環境的繁盛與衰落等大問題。民國北京的商業鋪保廣泛存在於訴訟、商業、宗教管理以及市民經濟交往等地方社會生活實踐中，以此為切入點，可以考察近代北京城市轉型過程中的人口流動與經濟資源運作，亦可從個人和社會組織之間形成的關係網絡中揭示北京城市基層社會的生活結構。<sup>④</sup>

一些似乎很熟悉的“老問題”，也被不斷闡釋出新意。以北京人力車夫為例，研究者可謂“前仆

後繼”，民國時期就有比較多的社會調查。<sup>⑤</sup>此外，人力車夫也出現在很多當時作家的筆下。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於人力車夫群體背後所反映的新生事物（如市政機構、商會、工會和警察等）與傳統因素（舊的行會、水會和慈善組織等）的矛盾衝突。<sup>⑥</sup>最近的成果是孔雪與岳永逸的研究。他們認為，不同政治集團出於不同目的，合力將人力車夫的身體推向了肉搏的前台，從而使之在行業公會內部、政府與黨部等北平多種政治力量的博弈場中曇花一現式地粉墨登場。<sup>⑦</sup>王升遠則另闢蹊徑，討論了近代日本文化人筆下的北京人力車夫，呈現出另外一種文化視野下的觀察。<sup>⑧</sup>

學界以往對於近代北京公園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焦點集中在公園與市政、公園與市民生活、公園與都市文明，以及公共空間闡釋框架下國家利用公園進行的教化規訓、權威塑造等方面。近年來，林崢主要從“現代性”的方面探討了公園在近代北京的特殊歷史境遇。<sup>⑨</sup>鞠熙則從民俗學視角繼續推進了對近代北京公園的考察與闡釋。她認為，舊日北京並不缺少休娛樂的場所，進香、遊賞、節會等活動都帶有休閒性質，地點往往在寺廟中或在其附近。但銳意創建新公園的官僚與知識分子“遺忘”了它們的存在，深層原因是他們頭腦中的西方時間體系、工業革命時代的城市理想，以及現代社會中身體控制的理念。<sup>⑩</sup>這些成果的持續推出構成了一條線索清晰、不斷遞進的學術史譜系。

以往近代北京史研究中的一些薄弱地帶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以抗戰時期的北平為例，在文化環境、城市規劃等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明顯的進展。老一輩學者中，張泉對於淪陷時期北平文學的研究值得關注；桑兵利用朱家驊檔案考察了這一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化界的組織活動。孫冬虎、王均探討了淪陷時期日偽政權對北平的城市規劃以及北平地域結構的變化。<sup>⑪</sup>近幾年來，隨著一批青年學者的湧現，改變了抗戰時期北平歷史研究沉寂的局面。<sup>⑫</sup>

淪陷時期，北平在政治環境、行政管理體系、經濟運行、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對此仍然缺乏瞭解，許多方面還未能完成基本的史實重建。同時，很多問題也需要更全面的視角與更審慎的評價。如北平原有統治體系不斷遭受衝擊，在新秩序建立的過程中，侵略與抵抗並非截然分明，中間存在著大量的模糊地帶。在宏觀的戰爭背景中，形形色色的人群展示出非常複雜的面相。即便是通常被視為“漢奸”的偽政權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夾雜著順從、屈服、抵抗與算計，這些問題需要被正視。一方面，侵略與反侵略、殖民與被殖民的解釋框架仍然不可動搖。但除此之外，還可以在民族主義視角之外，嘗試尋求更加符合當時歷史樣態的合理解釋。

北京市檔案館作為保管近現代以及當代北京檔案的專門單位，館內收藏的許多近代北京檔案已經完成數字化並對外開放，相對以往，學人們對檔案的檢索與使用都更加便利。大量的報紙與刊物是重要的基礎性材料，如《大公報》、《晨報》、《益世報》、《世界日報》、《北平晨報》、《順天時報》、《北洋畫報》等；刊物如《市政評論》、《社會學界》、《宇宙風》、《京都市政匯覽》等，其中刊載了巨量的近代北京的多個側面的報道。一些社會調查史料、市政公報、商業帳簿、北京指南等也得到系統整理，有些已經出版。<sup>⑬</sup>

除文字之外，圖像（包括地圖、照片等）也是重要的基礎性資料，尤其是地圖的應用，對於釐清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間結構，包括街道系統演變、城市景觀體系構建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7年，北京出版社成套推出三卷本《北京歷史地圖集》，從基本環境特點、人地關係、政區變化、城市形態、經濟活動、軍事部署、人口發展、文化分布、城市社會結構等方面，展現北京城市及北京地區的歷史地理演變過程。總體而言，在當前各種資料數據庫的大規模建設以及研究者檢索能力大幅度提

升的背景之下,最關鍵的是對資料的選擇、辨析、闡釋能力,考驗著研究者的智慧與眼光。

## 二、多學科方法的融匯與碰撞

城市本身是多元的,城市史天生就是一個綜合性、多學科融匯與碰撞的領域,近代北京複雜紛繁的歷史場景早已不是歷史學的封閉領地,文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地理、藝術、建築等不同學科都可以在城市史領域有所作為。新的理論、概念、方法的嘗試,對城市史研究面貌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地理學與歷史學的結合在北京史研究中運用得最為成功。從學科特點上而言,歷史學主要關注時間,地理學主要關注空間。近幾十年來,兩者相互滲透的趨勢日益明顯,體現在城市史研究中,形成城市歷史地理學。其聚焦於城市不同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與演變規律,關注城址、地貌、邊界、河道水系、交通區位、街巷、建築、環境等因素,結合文獻考證、實地調查,吸收考古學、建築學的理論與方法,尤其重視歷史地圖的編製及其應用,已經成為北京史研究中最具典範性的方法之一。<sup>⑭</sup>

與此同時,與地理學關係密切的“空間”概念的引入,可以視為近代北京史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突破。在世界範圍內的城市史研究中,“空間”曾被視為一個單純承載使用功能的地理場所,或者一種純粹的客觀存在。但隨著近幾十年來眾多學科方法的交匯與融合,尤其是列斐伏爾、福柯、哈維等人的相關理論貢獻與衝擊,“空間”被賦予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內涵,成為一個帶有複合意義的概念。體現在城市史研究中,“空間”不僅可以被作為一個具體的研究對象,“空間維度”更是一種研究視角或闡釋方式。<sup>⑮</sup>“空間思維之於歷史研究,關鍵在於研究的設計之中,是否能把空間結構看作權利以及資源關係的產物,把空間形態解讀成具有社會文化經濟意義的歷史積澱”。<sup>⑯</sup>這種研究模式強調從“空間維度”考察有關城市的多個面相,探討城市空間變革背後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動因,關注特定空間內部的社會關係與等級秩序變化,尤其關注“權力”因素在空間重構中的運作痕跡。此處的“權力”概念既包括政治權力,也包括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權力(如商業資本)與市政技術等。相對於以往那些顯性的對象,現在的研究者越來越關注那些城市發展進程中不能被輕易看到的隱性因素。

具體落實到近代北京,空間維度的應用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城市空間結構演變過程及一般規律的探討,對公園、廣場、商場、街區、城牆等領域的微觀考察,對於一些個案的細節描述已經比較扎實與充分。<sup>⑰</sup>另一方面,注重考查空間內部的秩序形成與關係網絡。<sup>⑱</sup>可以說,“空間維度”作為一種研究範式已經基本成型,在城市史研究中的地位逐漸被確立,並表現出越來越蓬勃的趨向。<sup>⑲</sup>

城市史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運用方面,近年來的一個最新趨勢是借助新的技術手段,運用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縮寫為GIS),通過技術分析,使史學結論有更扎實的數據支撐。<sup>⑳</sup>比如,根據近代北京不同時期的地圖,釐清近代北京高等院校、行政機構、主要商業設施的地理位置分布,及其與城市空間布局的關係。李孝聰《民國時期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的空間敘述》、張佩瑤等《從歷史GIS角度看民國北京中西醫服務與城市交通的關係》、吳海傑《北京都市法律文化的空間結構》都是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應用於近代北京研究的有益嘗試。<sup>㉑</sup>

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在城市史研究中已經得到廣泛運用,階級、街區、消費等是城市史研究中需要借助的重要分析概念。章英華較早從“社會區位”(social ecological)理論分析20世紀初(時段基本限定在1900~1935年)北京內部結構的變動。這一理論圍繞兩個主題,土地利用的功能區分與

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家戶居住配置。通過相對詳細的數據分析比對，章英華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從整體看來，由於官吏、工商業者、無技術勞動等的低隔離狀態，使得北京雖有內外城的行政和商業對比，但並未顯示明顯的階層隔離現象。<sup>②</sup>這種思路在當前城市史研究中一直被沿用，展現出持續的生命力。

市場作為一個特定的消費空間，如果從區位分布、消費模式、目標人群等方面考察，實際上牽涉到更廣泛的內容。高松凡探討了自元代至民國時期北京市場的發展變遷，分析了歷代北京城市市場空間分布的形成演變及影響市場區位的主要因素。<sup>③</sup>許慧琦以城市消費的發展為主軸，考察了北平從遷都之後到抗戰之前（1928~1937）發生的各種新變化，包括政軍情勢、人口結構、商業趨勢、文化資源、消費主力、婦女職業、市民娛樂、市府規範等。<sup>④</sup>王建偉也探討了消費空間問題，但更關注的是城市空間重構背後新的等級關係劃分。<sup>⑤</sup>

一批文學學科研究者的進入，是近年來北京史研究中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有關近代北京的各種文學記錄，為這種研究路徑提供了非常充分的文本，老舍、張恨水、夏仁虎、瞿宣穎、沈從文、林海音等人的作品，保留了豐厚的北京歷史記憶。<sup>⑥</sup>文學視角借助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體裁的文字，將城市作為一個文本來閱讀，發掘不同眼光視野之下呈現出的北京“城”與“人”。2003年10月，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合作召開了“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收錄了相關研究的大部分代表性成果。<sup>⑦</sup>以本次會議為標誌，文學學科開始大規模正式進入北京史研究之中，進而成為近年來很具代表性的方法論。<sup>⑧</sup>

北京史研究需要多種學科的共同參與，這已經是學界共識。一本出色的北京史著作不應囿於單一學科、單一視角，而應該是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方面的融合。不僅有局部的深描，還應有恢弘的歷史大視野。應該將其置放在近代中國歷史命運變遷的時代背景中，走出單純的風物記載或掌故之學，通過多學科方法的有效運用以及更加堅實的學術訓練，去呈現城市的複雜性與多層性。

### 三、國家視野與地方視野

城市史研究通常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縱向上以城市文明演進為研究對象，關注其起源、發展、演變各個階段的歷史面相與特性；橫向上關注城市空間結構、治理體系、經濟運行、建築景觀、人口、環境、日常生活、文化生態等。對於近代北京史而言，又有很強的特殊性，除了牽涉一般意義上城市史研究中關注的縱向與橫向內容之外，還在於作為國都的政治身份，北京是很多國家重大事件與現象發生的歷史舞台或地理空間，為它們提供社會場景，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規定或制約著那些事件與現象的表現方式與最終走向。後者這種方式雖未把城市作為直接的研究對象，但城市的某種特性與樣貌也在相關事件與現象的敘述中獲得了呈現。

近代北京史研究中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就是如何有效處理好國家視野與地方視野的關係問題。很長一段時期，由於不能有意識地區分國都與城市是兩種不同的概念，一些成果過於突出北京的地方性，焦點完全局限於城市內部，眼光受限，對近代北京作為國都以及“故都”的身份變動這一背景因素考慮不足，缺乏一種整體的眼光與自覺；另一些成果則是國家視野凌駕於地方視野之上，近代史或民國史的敘述脈絡被不加轉換地應用到北京史的解釋框架中，似乎發生在這座城市的任何事件、現象都可以作為北京史的研究對象，近代北京史成了中國近代史或民國史的地方版本，城

市史成了國家史的附庸或“縮微景觀”。

一方面,近代北京史不可能完全抽離出區域或國家層面進行論述。自元代以來,北京作為全國性都城的角色一直是客觀存在的,城市中方方面面的痕跡無不印證著這種身份。近代北京更是與近代中國的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地方層面的一舉一動也往往牽涉更廣闊的時局變動。以1928~1937年間的故都為例,北平的政治格局呈現非常混沌的局面,很多地方性事件背後都關係到複雜的權力博弈與利益衝突,涵蓋中央與地方、國民黨內部各派系、政府與黨部、政府與軍隊、政界與商界、商會與工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與糾葛。齊春風以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為中心,探討了北平市政府、市黨部與商界的爭執與對抗,背後還引發中央與地方、國民黨內部的新舊、黨政之間的路線之爭。<sup>②</sup>杜麗紅考察了這一時期北平的工潮,關注的也是國民黨的黨政關係。<sup>③</sup>張皓以北平臨時分會為例,反映了國民黨各派對華北的角逐。<sup>④</sup>賀江楓考察了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局長的任免,其中涉及到中央政府與東北軍對於北平地方權力的爭奪,並反映了何應欽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與黃郛領導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的分歧與矛盾。<sup>⑤</sup>擴展開來,整個故都時期北平獨特的權力結構以及政治生態等吸引了很多民國史研究者,所得結論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的城市史範疇,但城市作為一個社會場景則始終存在。

另一方面,如果過於凸顯北京的政治身份,則容易遮蔽城市自身的變遷線索與內在發展動力,造成近代北京“地方性元素”的缺席,這也是一段時期內阻礙北京史研究進展的主要原因。近代北京史研究興起之初,曾被“包裹”在中國近代史或民國史的敘述脈絡之中,北京作為“地方”的歷史隱而不彰,北京城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現象往往容易超越地方層面,上升到國家事件與國家視角。典型者,如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盧溝橋事變等。對此,我們不應刻意迴避這些事件所具有的“國家”與“全域”意義。同時,如果從北京史的立場出發,這些事件背後的“地方”背景也需要被呈現、被敘述。我們需要追問,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北京產生了什麼關聯,北京的政治生態、文化氛圍、社會結構等方面為運動的發生提供了什麼樣的土壤?<sup>⑥</sup>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內的思想論爭、輿論環境、大學教育對於整個時代的文化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顏浩與季劍青的研究代表了當前對近代北京文化研究的一種新的視野與進路。<sup>⑦</sup>對於盧溝橋事件,袁一丹努力還原了淪陷前後北平社會所經歷的種種變動與諸多細節,發掘了戰爭對城市造成的巨大影響,包括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以何種心態、何種方式面對這場變故。<sup>⑧</sup>

國家視野與地方視野在近代北京史研究中的有效兼顧,也體現在對象的選擇與視角的運用方面。以典型的宮廷研究為例,不能認為宮廷內部的歷史就自動等同於北京史,很多發生在紫禁城內部的事件其實與北京城關係不大,但如果轉換視角,則有所不同。正是由於紫禁城的存在,影響了北京城的空間結構、商業體系、人口分布等。宮廷內部的生活消費與日常採購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北京城的經濟形態,對於北京經濟史的研究,宮廷消費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民國建立之後,仍有紫禁城“小朝廷”的存在,並與北京社會關係密切。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驅逐溥儀離開紫禁城,以往的論述多限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框架之中。實際上,這次事件對北京社會層面引發的震動效應不可忽視,皇室成員恐慌心態加重,變賣、轉移家產,對城市空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與之相應的是,溥儀出宮,直接加速了“故宮博物院”的對外開放。<sup>⑨</sup>同時,1924年也是北京城市管理體制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第二年,四郊與城區共同納入同一套管理體系之中。

實際上,國家視野與地方視野只是看待問題的兩種角度,二者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形成了互相參照與補充,人為割裂二者的聯繫並非客觀的歷史態度。我們需要做的是在認同“國家”在場的前

提下,努力挖掘那些事件與現象背後呈現的近代北京“地方史”特徵。同時,也應深入關照與闡釋一些地方或局部事件所具有的更加廣泛的全域性意義。

#### 四、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深化路徑

近代北京城市形態、角色、功能等方面的複雜性與特殊性,超過國內任何一個其它城市,這正是其最大優勢與魅力所在。一個城市的內在脈絡越繁瑣,學術路徑就越豐富,學術潛力也就越大,在帶來更大研究難度的同時,也為精彩成果的產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這種特徵使近代北京史研究更有可能在方法論意義上形成突破,從而出現有別於中國城市史研究現有模式的、出色的創新性成果。

與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史相比,近代北京史不應將自身限定在“地方史”範疇,不應僅止於對“地方性知識”的描述,而是應該開掘出更具普遍意義的理論命題,建立對話平台,在更寬廣的學術路徑中凸顯北京城的“存在感”,充分利用近代北京城市身份的特殊性與變動性做足文章。它探索的一些命題已經超越了城市史範疇,如民族主義、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中外關係等方面。因此,考察北京這一個案,也為重新認識和理解近代中國提供更加豐富與別樣的視角。

近代北京史不是中國近代史的局部演變過程,不是民國史的從屬,不是通史內容的簡單“地方化”複製,因此無法原樣照搬中國近代史已經形成的論述框架。近代北京史應有明確的學科屬性與定位,摸索出一套適合自身的理論體系(包括研究疆域、方法、路徑等)去解釋歷史上發生的諸多事件與現象。

鑑於近代北京史的特殊性,相關研究需要超越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史;在分門別類研究的基礎上,揭示近代北京城市內部各個領域之間的橫向聯繫,運用貫通性的整體視野,從城市興衰與國運升降的關係角度進行審視,系統梳理北京從一座傳統帝都到近代城市的轉型脈絡,呈現城市變遷過程中變與不變的部分,展示近代北京的城市氣質與特徵,由此形成一種學術範式,既包含一般城市史學的共性,也包含北京史的個性。

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近代北京史需要有效借鑑國內其它城市史研究的成功做法,同時也應密切關注海外動態。上海是重要的參照,南京、重慶、杭州、武漢、天津等城市史研究也有很多可供吸收之處。<sup>⑤</sup>同時,也可將近代北京置於全球城市發展體系的坐標之中進行考察,如與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等進行對比。<sup>⑥</sup>這裡的比較不僅是城市本身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城市研究現狀、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的差異。

在城市比較中,既要注意到城市的“可比性”,也要避免出現“同質化克隆”現象。即將某一城市相對成熟的套路模式化照搬,移用到另一座城市研究之中,得出的結論也難免似是而非。任何一個城市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都有各自的發展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只是提供了觀察城市的另一種視角。確立一個參照物,將北京納入到一個區域體系或對照坐標之中,在相互映照中,可以凸顯北京的城市特性,同時也可能將因為“熟視”而導致“無睹”的那些現象更完整地揭示出來。

城市化、西化或者說城市的“現代性”,是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很具代表性的研究模式,但這並不完全適用於北京。與一些沿海、沿江城市不同,近代北京缺少強有力的外部因素去助推城市化進程,而且隨著國都身份的跌落,城市化內在驅動力也一直較弱。與此同時,相對於其它城市,近代北京城市化進程中需要面對的傳統力量更為強大,受到的束縛也更多,有自身獨特的近代化道路。

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對所謂現代性變革中相對較“新”的一面關注更多,而對那些較“舊”的一

面則關注不足,尤其是那些變化幅度不大的事物或現象。2014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董玥教授的《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由三聯書店出版。作者討論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傳統的回收與循環”,其中即包括對物質的回收與循環,也包括有意識地對過去所擁有的價值的認識與珍惜,並讓它們作為“活著的傳統”而在日常生活與新的創造中繼續生存下去。<sup>39</sup>正如一篇關於該書的書評所指出:“董玥的貢獻在於,她揭示了民國北京看似落後和傳統的面向其實包含著活躍的能動性,並將其有效地納入到一個更加富於彈性的現代性的闡釋框架之中”。<sup>40</sup>董玥沒有簡單沿用線性發展的概念,並未將一段複雜的歷史簡化為一個“以新代舊”的過程,而是再現了“新舊共存”的複雜歷史場景,這一點在近代北京歷史上確實比較明顯。在那段特殊的時期,傳統與現代、舊與新並沒有明確的界線,而是彼此纏繞,這也提示我們不能先入為主,要特別注意近代北京那些“不變”或“緩變”的因素。

在聚焦城市內部的同時,近代北京也需要將探索的目光轉向外部,衝破囿於城牆之內的偏狹意識,向城市外圍的腹地延伸,從更廣闊的區域維度去考量。具體而言,就是注意北京與周邊地區的地緣關係,關注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橫向聯繫與往來互動,包括貿易、道路交通以及商品、人員流通等。一般而言,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並存於一個區域或城市體系之中。只有將城市放在一個區域或跨區域體系之中,才能在彼此的聯繫與對照中得出更加深刻的結論。北京在華北交通體系中居於中心位置,整個華北地區的陸路交通線均指向北京,尤其是鐵路興起之後,北京的區位優勢得到進一步強化。同時,由於處於華北平原與蒙古高原交界處,也是中原地區通向西北地區的必經之路。研究經濟問題,需要關注北京城的商品供應與整個華北市場體系的關係,關注北京與西北地區的商貿往來。研究近代北京的人口問題,需要注意到周邊地區的河北、山西,尤其是九一八之後東北移民群體對北京城各方面的影響。

在近代北京特定的時空範圍內,不少專題已經走過了前期積累階段,在史料數據庫建設取得明顯進展的技術條件下,如今對許多局部領域的描述已經比較細密,一些基礎性問題的釐清也取得了相當成績。與此同時,如何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論思考,避免將各個局部變成破碎的互相割裂的片段,這是一個艱巨的挑戰。局部是構成整體的基礎,但整體史並非是局部的簡單疊加,政治、經濟、文化專題研究的結合並不必然構成整體史。如果沒有理論思維的提升與有效方法的運用,即使再湧現更多的描述,填充的只能是更多的局部細節,無法對既有結論提出挑戰,更無法構建起新的研究範式。

## 餘 論

近十年來,中國學術發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我們收集材料的深度、廣度與便利程度大大增強。有關近代北京的政治、空間、建築、文化、社會、記憶等領域持續湧現新作,研究疆域不斷拓展,在理論與方法層面的學術自覺也正在形成。不過,考慮到北京歷史的複雜性與多層性,考慮到北京在中國乃至世界城市體系中的地位,目前的學術進展還不能與之完全匹配,仍有眾多問題需要深入探討,尤其是需要適時出現幾部能夠高屋建瓴地從多個視角系統揭示近代北京城市發展演變軌跡的通史性成果與典範性著作,並在方法論意義上形成突破,真正提升北京史在中國城市史學科體系中的學術地位與學術品格。從目前的情況看,至少已經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但關於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未來,仍然任重道遠。

①黃興濤、陳鵬合作選編的《民國北京史研究精粹》(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導言部分已經介紹了近十幾年來民國北京史研究的最新進展及相關問題,書中也收錄了部分優秀成果,本文對該文中已經論及的內容不再贅述。需要說明的是,有關近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數量眾多,本文難免挂一漏萬。

②上海是海外中國城市歷史研究領域最為關注的個案,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地對上海的研究明顯超出其它國內城市。據200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書目》所列,截止2005年底,單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上海文獻,以及部分海外駐國內機構出版的外文文獻,即多達4,092種。據周武先生在《上海學》“發刊詞”中所指出,“就其趨勢而言,近30多年來尤蔚為大觀,舉凡政黨、幫會、同鄉會、道台、警察、資本家、職員、文人、畫家、記者、藝人、工人、女工、妓女、乞丐等等,靡不有專精的研究”。參見《上海學》第一輯“發刊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③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張復合《北京近代建築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岳永逸《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街頭藝人的生成與系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王亞男《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邱志紅《現代律師的生成與境遇:以民國時期北京律師群體為中心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丁芮《管理北京:北洋政府時期京師警察廳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王煦《舊都新造:民國時期北平市政建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杜麗紅《制度與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衛生,1905-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陳庚《傳承與新變:近代化進程中的北京戲劇市場研究(1912—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在2016年推出“民國北京史研究叢書”,包括《北京的“洋市民”:歐美人士與民國北京》(李少兵等)、《民國北京犯罪問題研究》(馬靜)、《北京婢女問題研究(1912—1937)》(張秀麗)、《民國北京的公共衛生》(何江麗)等。

④詳見周錦章《清末民初北京銅器作坊的轉型與發展》(北京:《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董曉

萍《流動的代理人:北京舊城的寺廟與鋪保》(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周錦章《論民國時期的北京商業鋪保》(北京:《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⑤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狀調查》,北京:《社會學雜誌》,第2卷第4號,1925年4月;房安福原:《中國的人力車業》,上海:《社會月刊》,第2卷第7號,1931年1月。

⑥參見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⑦孔雪、岳永逸:《生計、文學與政治:被消費的身體》,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⑧王升遠:《“近代”的明暗與同情的國界——近代日本文化人筆下的北京人力車夫》,北京:《外國文學評論》,2013年第4期。

⑨林崢:《北京公園:現代性的空間投影(1860—1937)》,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⑩鞠熙:《民初北京公園理念與傳統公共空間轉型:以1914—1915年北京城市改造為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⑪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年;《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桑兵:《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動》,北京:《中國文化》,第24期,2007年;孫冬虎、王均:《民國北京(北平)城市形態與功能演變》,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5年。還可參見李斐亞:《淪陷時期的北京高校:可能與局限,1937—1945》,載楊天石、黃道炫編:《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⑫袁一丹:《北平淪陷時期讀書人的倫理境遇與修辭策略》,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陳言:《忽值山河改:戰時下的文化觸變與異質文化中間人的見證敘事(1931—1945)》,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王升遠:《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鄭善慶:《何以自處:北平留守知識分子的心態與境遇》,北京:《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賈迪:《1937—1945年北京西郊新市區的殖民建設》,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

1 期。

⑬主要包括《北平市統計覽要》、《市政統計月刊》、《北平市市政公報》、《北平市都市計劃設計資料第一集》、《北京近代教育行政史料》、《北京自來水公司檔案史料(1908—1949)》、《北京電車公司檔案史料(1921—1949)》、《北京經濟史資料:近代部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規》、《北平歷屆市政府市政會議決議錄》、《二十世紀北京城市建設史料集》、《日偽北京新民會》、《抗戰時期北平電影活動史料集》等。

⑭侯仁之與唐曉峰主編的《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雖然有關近代北京的內容很少,但可視為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⑮參見陳蘊茜:《空間維度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上海:《學術月刊》,2009年第10期;唐曉峰:《哈維的城市空間》,北京:《讀書》,2010年第5期。

⑯葉文心:《空間思維與民國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⑰熊遠報:《八大胡同與北京城的空間關係:以清代和民國時期北京的妓院為中心》,北京:《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唐曉峰:《新華街:民國北京城改造個案述評》,西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1卷第3輯,2016年7月。

⑱程為坤主要從城市公共空間的角度考察了清末民初北京普通女性的生活經驗,他認為,此時的女性已經開始傾向於將公共空間根據自己的需要改造成日常的生活空間,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展示出主體性的力量,但同時也為尋找生活的這種意義而付出了代價。參見程為坤:《勞作的女人:20世紀初北京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楊可譯,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

⑲相關討論參見王建偉《空間概念與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福州:《福建論壇》,2018年第2期。

⑳鮑寧、趙寰熹:《地理信息系統在城市歷史地理研究中的應用——以近代北京城市分區研究為例》,武漢:《理論月刊》,2016年第8期。

㉑以上文章均收入蘇基朗主編《中國近代城市文化的動態發展——人文空間的新視野》,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

㉒章英華:《二十世紀初北京的內部結構》,台北:《新

史學》(創刊號),1990年3月。

㉓高松凡:《歷史上北京城市市場變遷及其區位研究》,北京:《地理學報》,1989年第2期。

㉔許慧琦:《故都新貌:遷都後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1928—1937)》,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8年。

㉕王建偉:《王府井與天橋:民國北京的雙面敘事》,上海:《學術月刊》,2016年第12期。

㉖出版市場上有多種書寫北京的經典文本彙編,典型者如《北京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姜德明編,上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姜德明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讀城:大師眼中的北京》(劉一達編,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6年)、《北京讀本》(陳平原、鄭勇主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內中收錄的文章多有重複。

㉗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㉘代表性成果可參見趙園:《北京:城與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季劍青:《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

㉙齊春風:《北平黨政商與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北京:《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黨政商在民眾運動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為中心》,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㉚杜麗紅:《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與國民黨的蛻變》,北京:《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㉛張皓:《北平臨時分會的設置與撤銷:國民黨各派對華北的角逐》,太原:《晉陽學刊》,2011年第5期。

㉜賀江楓:《蔣介石、黃郛與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易長風潮》,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2期。

㉝陳平原努力還原了五四運動當天的歷史現場,包括學生具體的行進路線,甚至考慮到當時北京初夏的天氣對群體性心理的微妙影響,參見陳平原《五月四日那一天——關於“五四”運動的另類敘述》,收入氏著《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49頁。相關研究還可參考楊早《清末民初北京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㉞顏浩:《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文人團體:1920—

192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季劍青：《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⑳袁一丹：《北平淪陷的瞬間——從“水平軸”的視野》，《文化研究》第17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亦可參見謝蔭明：《由七七事變引起的北平社會動盪》，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3期。

㉑季劍青：《“私產”抑或“國寶”：民國初年清室古物的處置與保存》，北京：《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李坤睿：《王孫歸不歸？——溥儀出宮與北洋朝野局勢的變化》，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㉒北京與國內其它城市的比較研究成果也並不少見，參見邱國盛《中國城市的雙行線：二十世紀北京、上海發展比較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許小青《首都遷移與“最高學府”之爭——以北大、中央大為中心的探討（1919-1937）》，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出站報告，2008年；李怡、張敏《“中心”與“外圍”：文化意義的生成與生長——以北京文化與

巴蜀文化的比較為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潘靜如：《“兩京”淪陷區清遺民的“位置”——以〈雅言〉〈同聲月刊〉雜誌為中心》，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1期。

㉓以巴黎為例，翻譯成中文的就有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的首都》（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大衛·哈維《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黃煜文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

㉔該書是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的基礎上重新完成的中文版。

㉕季劍青：《民國北京的現代經驗》，北京：《讀書》，2015年第2期。

作者簡介：王建偉，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北京 100101

[責任編輯 陳志雄]